

評介曾士榮著《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 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 (1912-1955)》*

莊勝全**



書名：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
(1912-1955)

作者：曾士榮

出版社：新北：稻鄉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 年

頁數：296 頁

一、前言

具有多重知識傳統的臺灣史研究，在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史料的發掘與史料範圍的擴大充實，研究取徑也轉為提倡臺灣中心觀點，以臺灣島嶼及人民歷史為主要問題意識，成為臺灣史領域的重要特徵之一。¹ 近年來各色日記史料的面世與運用，更加突顯了此項研究特徵。以 1920 年代以後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研究為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纂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

* 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惠賜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來稿日期：2013 年 6 月 13 日；通過刊登：2013 年 8 月 18 日。

¹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 2 (2009 年 12 月)，頁 161-184。

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是早期相關著作極為倚重的重要素材。² 警察沿革誌雖然能提供許多政治社會運動過程的線索與歷史訊息，卻是一部出自統治者的觀察紀錄，其觀點不僅無法涵蓋政治社會運動的內容與意涵，也難以得知運動參與者本身的思想與主張。甚至，更不免摻有統治者一廂情願的片面紀錄與失真的詮釋。³

相對而言，由知識分子策劃、發行的《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及《臺灣新民報》等一系列報刊史料，即可彌補這方面的缺陷。1980年代以後，研究者陸續運用民報系列史料，重構1921至1934年間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細緻過程；⁴ 論證議會設置運動與內地延長、大正民主及帝國議會之間的關係；⁵ 分析《臺灣民報》作為民眾發聲管道、啟迪民智、抨擊施政、整合各運動組織的角色；⁶ 解明與議會設置運動同步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歷經醞釀、誕生、成長與左右分裂的一頁滄桑史；⁷ 爬梳在政治社會運動過程中，臺灣知識菁英經由實踐而

² 1971年由葉榮鐘、蔡培火、吳三連等曾親身參與這段歷史的社會運動家合力撰寫的《臺灣民族運動史》，1972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許世楷所著《日本統治下の台湾》，均甚為倚重《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紀錄。參見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合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285。2000年，此書根據葉榮鐘手稿重新出版，並將作者由蔡培火等人合著改為葉榮鐘單獨著述，書名為《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另參見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

³ 如《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認為，1920年代臺灣的農民運動之所以發生，乃受臺灣文化協會民族啟蒙運動煽動之影響，並將一般的農民視為文化協會菁英從事政治對抗與傳播意識型態之工具。然而陳翠蓮利用《臺灣民報》重新檢證文化菁英與普羅大眾之間的關係，說明臺灣的農民運動其實相當具有自主性與能動性，並非依靠菁英階級、尤其是外來菁英之操控。參見陳翠蓮，〈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臺灣農民運動〉，收於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39-178。

⁴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9)。近來，周婉窈曾就近二十年來出土的新史料，重新回顧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過程與影響，及其與戰後臺灣「去殖民」(de-colonization)過程之間的關係。參見周婉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臺灣史料研究》37(2011年6月)，頁2-31。

⁵ 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1)。

⁶ 黃秀政，《〈臺灣民報〉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1920-1932)》(彰化：現代潮出版社，1987)。相關研究尚有楊翠與洪世昌說明《臺灣民報》與婦女運動、文化運動之間的關係。參見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洪世昌，〈《臺灣民報》與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1920-193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⁷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相關研究尚可參見張炎憲，〈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下冊，頁131-159。

形成的「臺灣人」認同與相應而生的政治論述、文化論述等。⁸

透過報刊史料的解讀，雖然比官方史料更得以捕捉運動參與者的主張與信念，但在拼湊政治運動的全貌與細節、運動參與者的思維心態，以及在政治社會運動之外的生活實態等面向上，仍力有未逮。關於這方面，非仰賴日記史料的運用不為功。透過日記史料的解讀，研究者不僅得以拼湊出更多政治社會運動不為人知的過程，更能進一步探查政治運動者的內心世界、日常生活及世界觀。目前臺灣史學界已舉辦過 5 次日記研討會，其中兩次更分別集結成《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出版，⁹ 內容旁及記主的人際網絡、生活節奏、國族認同、經濟狀況、訴訟經驗、宗教信仰、醫療體育、音樂體驗等。這兩本論文集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單純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考察對象，後者除了以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為主軸外，尚有蔣渭水等人的獄中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呂赫若日記》、《楊基振日記》、韓國的《求禮柳氏家日記》等已出版日記的相關研究，甚至〈林紀堂日記〉、〈林癡仙日記〉、〈王叔銘日記〉等未出版日記的史料價值之介紹。

在此基礎上，目前有關日記史料的發掘、整理、出版與研究方興未艾，例如廖振富自 2006 年以來發現、梳理櫟社要角傅錫祺所遺世的 35 冊〈傅錫祺日記〉，不僅兼具重構日治時期「文學結社」過程與文學研究的價值，也為體察日治時期臺灣人在身體改造、刊物出版與書籍購讀等方面提供更多元的線索。¹⁰ 又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陸續解讀、出版中的《黃旺成先生日記》，其內容與價值亦頗受研究者關注。這不僅是目前僅見公學校教諭所寫的日記，更記錄了黃旺成熟烈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新竹支部活動之歷程，及 1927 年分裂後的新

⁸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43-110；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7-1937）〉，《新史學》17: 2（2006 年 6 月），頁 127-218；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特別是其中的第一章至第五章。

⁹ 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該局，2005）；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¹⁰ 參見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 4（2011 年 12 月），頁 201-239。該文也對日記史料的蒐羅、出版，及在史學和文學領域的研究概況，有簡要的評介。

文協在新竹的活動內容，是得以審視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地方支部與中央部門溝通、協調及互動過程的重要依據。¹¹《黃旺成先生日記》之所以能問世，得力於曾士榮居中牽線，¹²在洽談皮藏與出版事宜的過程中，更進一步發現黃旺成長子黃繼圖亦有日記遺世，而這也成為本文所評介之《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的寫作契機。由於此書是目前少數使用〈黃繼圖律師日記〉的研究成果，在日記史料的解讀與運用上極具參考價值，因此本文擬評介此書以供學界參考。

二、內容介紹

本書除了導論、結論外，共分五章。在導論裡，作者除了簡介主角黃繼圖的履歷及其遺留日記的史料內容及價值外，更透過回顧晚近東、西方學界有關「(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與「私領域」(private sphere)相關研究成果，闡釋私人日記在探究公、私領域交疊、互涉，呈現多元樣態方面的特殊性，並說明本書在研究方法上兼採法國年鑑學派著重集體心靈狀態變遷的「心態史」(mentalities)、日記研究中側重「現代」家庭型態中「隱私權」(privacy)與「自我」(self)概念的展現，及「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中不斷重複的「日常性」

¹¹ 目前《黃旺成先生日記》已出版至第11冊(1912-1924)。有關黃旺成的生平及運用其日記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1)，頁71-114；張炎憲，〈黃旺成的轉折：從社會參與到纂寫歷史〉，《竹塹文獻雜誌》10(1999年1月)，頁6-28；陳萬益，〈臺灣報業史上的一等評論：論黃旺成的「冷語」「熱言」〉，《竹塹文獻雜誌》10(1999年1月)，頁29-40；黃美蓉，〈黃旺成與其政治參與〉(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莊勝全，〈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收於川島真、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269-302；黃麗雲，〈日治大正期臺灣俗信與日本祝祭在臺施行情況：黃旺成的日記情境摸索與解析〉，《臺灣史料研究》38(2011年12月)，頁83-134；吳沁昱，〈新竹市自治選舉與議會運作：以黃旺成政治參與經驗為中心(1935-1951)〉(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¹² 曾士榮也在第一時間將《黃旺成先生日記》與《吳新榮日記》搭配運用，探析臺灣人從日治迄戰後於認同意識上的轉折，參見 Shih-jung Tzeng, *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曾士榮，〈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2008年12月)，頁1-63。

(everydayness) 之價值與特性等三道取徑。〈黃繼圖律師日記〉(1929-1972) 中所呈顯的「近代心智」(modern mindset)，可歸類為「自由主義的現代性」和「布爾喬亞現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並具有「整體成套」、「多重向度」與「多義性」的概念特質，隨著變動的人生階段與隨之而來的歷史情境，產生重構與再構的變遷。

在主要內容部分，作者是以黃繼圖各個階段的人生經歷為經緯來呈現。第一章〈近代心智的醞釀〉介紹他在新竹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以下簡稱「臺北高校」）的求學過程中，心智發展上呈顯的階段性變化。中學校的軍事教育和體育競賽等近代學校（modern school）之課程，形塑了黃繼圖的「馴化性格與從順身體」，但一進入崇尚自由學風的高等學校後，他逐漸產生「反體制」的抗議意識，自我主體意識也開始鮮明化，特別是親身經歷 1930 年 9 月臺北高校罷課事件的衝擊，將他從中、小學馴化教育的規訓中解放出來，可視為其「近代心智」的醞釀期。就讀臺北高校期間，黃繼圖展露的反體制思維、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孕育的臺灣人意識、受社會氛圍影響而接觸社會主義的讀物，以及因黃旺成外遇而偷窺父親日記所呈現的隱私觀念，都是近代心智具體而微的展現。

第二章〈日本都會經驗與近代性的多元呈現（1933-1936）〉，以負笈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以下簡稱「京大」）法律科的求學生涯為主軸。甫入京大的黃繼圖，立刻就遭遇 1933 年 5 月的「京大瀧川事件」（主張自由主義的法律學者瀧川幸辰，其著作在政府施壓下禁止出版，並被免除教職），自臺北高校以來即培養的近代心智，驅使他加入京大自由派師生的陣營，反對國家權力深入校園。然而隨著日本政府日漸軍國主義化，身處日本本國都會情境中的黃繼圖無可避免地出現焦慮感與神經衰弱的病症。這些症狀一方面源自陸續爆發「美濃部事件」、「二二六事件」¹³ 的時事衝擊，另一方面也因為法律科畢業考試和高等文官考試的壓力，加上在現代文明中不得不機械式地依附主流價值參與司法官考試的焦慮。此外，對社會主義日漸憧憬的黃繼圖，在思想上趨向「普羅自我」，現實生活卻是沈迷於酒色的「小布爾喬亞（bourgeoisie，中產階級）的自我」，身、心靈無法合一，也

¹³ 「美濃部事件」（1935 年右翼與軍方勢力對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及其學說進行打壓）、「二二六事件」（受北一輝思想影響的皇道派陸軍官兵，於 1936 年 2 月 26 日發起的政變）。

是焦慮來源之一。在京都留學期間，他也目睹同樣來自臺灣的留學生之私生活，包括林玉秋夫婦的小家庭生活和林德富與已婚日本婦人間的戀情，都是私領域的現代性以多元樣貌呈現、過渡與變遷的見證。

第三章〈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I）〉討論黃繼圖法律心智之開展，和他如何走上專業律師之路。作者指陳在臺北高校期間對法律並無太大興趣的黃繼圖，之所以選擇法律專業乃是受到「臺灣人無出路」的社會心態影響，並隨著就讀京大法律科期間的種種經歷，強化他對法律專業的認同。193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日本殖民政府的戰爭動員與皇民化運動，臺灣社會形成一股「向公移行」、「揚公抑私」的心態；1936年黃繼圖大學畢業後，歷經任職新竹州廳與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再到辯護士實習訓練及回新竹開業，同樣逐漸與公部門產生密切的關連。1939年底在東京辯護士實習期間，父親黃旺成因被指控宣傳反日言論而捲入「新竹事件」並遭到拘禁，黃繼圖深知這是一起為了戰爭而捏造的人權蹂躪事件，在無可為力的情況下，只有更專注於實習課程和盡力通過考試。

第四章〈戰爭動員體制與近代性的重構（II）〉將重點置於二次大戰末期，黃繼圖於新竹開設辯護士事務所執業的狀況。這段期間，黃繼圖明顯展現「奉公」的心態，他一面加入「新竹辯護士總會」，透過各種交際維繫一個以法院為中心並跨越臺日種族界線的人際網絡；一面一反先前反軍國主義的態度，表現出支持戰爭的立場。這與皇民化時期法律制度被改造為以國家利益為主的新體制有關。1945年間，在美軍轟炸下，法院的功能大幅喪失，法務和警務人員士氣低落，唯黃繼圖基於生計與職責上的考量，仍積極尋求民眾的法律委託案。作者也透過黃繼圖所承接的「離婚」和「違反統制經濟」案件，說明戰爭時期法律與社會的關係。戰爭中缺少光明前景所產生的「普遍頹廢氣氛」，也曾籠罩著黃繼圖並使他沈迷於酒色，一度造成他與妻子阮木筆間的緊張關係，最後夫妻倆決定回歸家庭，在統制經濟物資配給不足的情況下，齊心合力尋求賴以維生的經濟基礎，反而體現出「由公向私移行」的心態趨勢。

第五章〈黨國體制與近代性的再構：1945-1955〉考察黃繼圖在戰後初期的律師生涯。戰後，黃繼圖等新竹地區的臺籍律師圈興起一股中國熱，與中國相關的議題成為他們的學習興趣，黃繼圖也加入父親黃旺成籌組的「三民主義青年

團」。但隨著戰後初期外省籍法律人全面主導司法體系，黃繼圖親見法院的審理品質和法律文化的缺失及腐敗，以及外省籍律師人數增加導致律師接案市場的平衡狀態遭到破壞，心中雖有司法改革之念頭，卻也感受到更多的無力感。在律師本業之餘，1950年代以後黃繼圖也開始參與政治事務，並奠定了「黨外」勢力在新竹地區的活動基礎。1951年中國國民黨阻擋拒絕入黨的黃旺成連任臺灣省議員，黃繼圖和妻子阮木筆因而投身參選新竹市代會主席和新竹縣議員，並在1955年一手主導戰後新竹兩大派系間的鬥爭，即力拱「東許」（許振乾，以經營新竹客運公司為主）陣營的莊金火，力抗代表「西許」（許金德，擁有新竹貨運公司）的林黃財，坐上新竹縣議會議長的寶座，成功結合黨外勢力對抗國民黨及其擁護者。整個過程可見黃繼圖自臺北高校以來培養的近代心智，而這正是內化自臺灣社會於1920年代政治社會運動就奠下基礎，並歷經二二八事件後所養成的「反體制」抗議傳統。

在結論的部分，作者除了概述本書援引的理論概念與各章節論點外，也一併提出未來〈黃繼圖律師日記〉的研究展望，特別是戰後在「私領域」的相關課題方面，諸如1960年代在黨國體制下的「隱私意識」和「自我意識」，以及海峽兩岸社會「私領域」的比較研究等。

三、綜合評論

本書重點式的介紹工作已如上述，通覽全書，可發現以下特點：（一）本書雖單純以日記史料為主軸，但援引多樣化的理論與概念來加強討論記主穿梭於公、私領域間的特性與意義。如透過「殖民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的考察，再配合晚近日記研究中探索私人生活與隱私的面向，和英國史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分析十六至十八世紀英國家庭史的發展與變遷時，所衍生的「情感個人主義」（affective individualism）之價值體系與世界觀，以及美國史家彼得·蓋伊（Peter Gay）分析維也納劇作家史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的日記，所描繪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階級的時代心靈等，都是本書在操作上的活水源頭，因此本書可說是將理論運用至實作的論著。

(二) 作者是目前少數已廣泛解讀黃旺成與黃繼圖父子日記，並為兩位主人翁的生平進行評述的研究者。藉由這樣的經驗，作者不僅在本書重現父子相互偷窺日記的私密過程、情緒反應及隱私觀，同時也讓兩套日記發揮互相對照、補充的功能。例如黃旺成於 1932 年退出臺灣新民報社的經過、想法及對整個家庭的衝擊，雖然最直接的紀錄〈黃旺成先生日記〉已軼失，但仍能透過黃繼圖的日記間接拼湊（頁 63-66）；1937 年黃繼圖自京大畢業回到新竹準備司法考試期間，在時代氛圍和就業壓力的逼迫下，透過父親的安排才暫時任職於新竹州農會，其日常生活與心情上的頹廢狀況，由於該年的黃繼圖日記已不復見，作者乃透過黃旺成的日記加以呈現（頁 130-135）。

(三) 本書透過對黃繼圖生平事蹟的追尋，說明其日記所展現的「近代心智」，以及隨著時代變遷而重構與再構的過程。對此，作者從歷史發展連續性的觀點和世界史的比較眼光出發，考察黃繼圖具有西方自由主義核心特質的近代心智，在歷經軍國主義化、皇民化的日治末期，以及戰後黨國體制的禁錮後，呈現何等的發展軌跡。另外，作者也從黃繼圖的律師事業，比較了日治與戰後在「法律與社會」相關議題上具有何等的延續、落差及斷裂，深具比較法學史的意義。

本書為臺灣日記史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與取徑，但書中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茲爰述如下：(一) 本書借採年鑑學派的心態史在情感、日常生活態度與價值觀方面的研究取徑，來探析黃繼圖的近代心智與日常生活，並企圖捕捉日治到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群眾所集體共有的時代心靈。然而心態史研究於 1960 年代在西方史學界發軔以來，便不乏檢討與批評的聲音，包括義大利微觀史家卡洛·金茲伯格 (Carlo Ginzburg) 在內，均指出心態史有兩個基本缺陷，其一為將社會整體設定成具有一個共同不變、同質性的觀念和信仰；其二是認為一個個體所有的思想及行為，都是由單一的心態結構所統御。¹⁴

¹⁴ 侯瑞·夏提葉 (Roger Chartier) 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收於陳建守主編，《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臺北：時英出版社，2008)，頁 415-421。另外，本書重要的對話者勞倫斯·史東實際上對於年鑑學派的方法論也抱持著質疑的態度，特別是年鑑學派在靜態的「結構」(static “structure”) 和動態的「局勢」(dynamic “conjuncture”) 之間，作方法論上的區分這一點上。史東也不接受年鑑發源於經濟學和人口統計學的基礎，經過社會結構的中間層，到意識形態 (ideology)、宗教 (religion)、政治信仰 (political beliefs) 以及心態 (mentalité) 所衍生的上層結構 (derivative superstructure)，這種決定歷史發展的三層模型 (three-tiered model)。他認為這種結婚蛋糕式的分析模式，預設了物質因素的優先地位要高於文化因素，因此他贊同韋伯 (Max Weber) 所關

將這樣的檢討放回本書的脈絡裡，雖然黃繼圖的近代心智具「多重向度」與「多義性」，但其近代心智是否為時人所共享？若是，真有如此同質性的心靈結構出現在臺灣社會嗎？若否，則其近代心智具有何等程度的代表性？一如本書曾言，在戰爭動員體制下，最初臺灣社會形成一股「向公移行」的心態，至戰爭末期則呈現「由公向私移行」的轉變。在這方面，許雪姬曾同樣透過日記史料指出，林獻堂雖然參與皇民奉公會的各项活動，但他仍不願改姓名、不穿著和服，保存漢文，以與日人有所區隔的態度，便明顯與前述黃繼圖的心態有別；¹⁵ 另外，陳翠蓮透過比較分析林獻堂、吳新榮、葉盛吉三部日記指出，戰爭末期雖然日本殖民政府透過嚴格的思想控制與政治教化，但臺灣人的政治認同並未因此被塑造一致，而是呈現非均質化（non-homogeneous）的狀態，不同的世代、環境與生活體驗都會造成心態上的若干差異。¹⁶ 準此，作者須再評估黃繼圖的近代心智之適用範圍。

（二）談到代表性的問題，黃繼圖在臺灣近、現代史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定位為何，也是作者較未措意之處。換言之，作者雖然細緻考察黃繼圖各個階段的人生歷程並賦予其意涵，但這樣特殊的個人生命經歷究竟應該放在何等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彼得·蓋伊的著作《史尼茨勒的世紀》同樣以日記為題材，也同樣從史尼茲勒的父親偷窺其日記而引發的衝突揭開序幕，成為作者在書中屢次援引的參照指標。然而，蓋伊在〈序言〉便指出其目的在於透過對史尼茨勒生平的追尋，重構出十九世紀歐洲布爾喬亞階級形形色色的生活景況，他更特意強調史尼茨勒的生活方式僅只能當作一個特例，而非當時該階級的典型。不過，因為史尼茨勒的醫學知識、廣泛的閱讀量以及時常化身花花公子遊走布爾喬亞階級各個層級間獵艷之故，使他的日記與作品得以不時呈現該階級內部各種不同身分與職業人們的生活樣貌。亦即蓋伊並非只將重點置於史尼茨勒生命史的重現，更將他視為一

釋，這三個層次是處於持續性動態交互作用的狀態，而不是在支配和依賴的層次結構中。參見 Lawrence Stone, "The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 A Life of Learning," *ACLS Newsletter* 36: 1/2 (1985), p. 18.

¹⁵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年6月），頁167-211。

¹⁶ 陳翠蓮，〈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收於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頁223-279。

面時代的鏡子，來映照出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的世界觀、價值觀、品味、情欲等。¹⁷ 蓋伊為主角所標示的歷史定位，同樣有值得作者參酌之處。

(三) 本書各章節是按日記記載的年分，以黃繼圖各階段的人生經歷編排，各章均以他各階段的學、經歷或工作經驗為經，再以其心智思想狀態、私生活、隱私觀及家庭生活為緯（唯第五章礙於日記缺漏，並未觸及「私領域」方面），交織成一幅黃繼圖的人生圖像。這樣的安排雖然足以觸及黃繼圖人生階段的各個生活面向，但讀者必須自行歸納才能得到較清楚的脈絡。作者或可先將黃繼圖公領域的人生經歷、身處時代背景及社會條件、文化狀況說明清楚，再將漸趨私密的近代心智、思想轉折、日常生活和個人興趣、家庭與夫妻關係等各個層面，做專題式的處理，當能更加擴展本書的縱深。¹⁸

(四) 如上所述，作者已有大量解讀黃旺成、黃繼圖父子日記的經驗，本書也巧妙地將兩部日記搭配使用以填補其間空白的年分，若能進一步搭配同時代的其他日記進行比對，當能解明更多的空白與創發更多的課題。例如黃旺成退出臺灣新民報社的經過，除了可由黃繼圖的日記找到線索，《灌園先生日記》與《蔡培火日記》同樣留有黃旺成因在《臺灣新民報》的「冷語」專欄嘲罵楊肇嘉，而由通信部長降職為新竹支局長的紀錄；¹⁹ 又根據黃繼圖在日記中的描述，觀賞電影是他重要的生活休閒與紓壓管道（1935-1936年間，平均一年觀賞110部電影，且多為戰爭片。參見本書頁84），這方面便與興趣為觀賞戲曲、閱讀及植栽的黃旺成有所差異，亦即父子透過休閒活動來認識與理解世界的方式有所差異。若能將黃旺成那一輩多屬「遺民世代」與「乙未新生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者，與黃繼

¹⁷ 彼得·蓋伊（Peter Gay）著、梁永安譯，《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1815-1914》（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10-18。相對於蓋伊筆下的史尼茨勒呈現一副登徒子的形象，在另一位美國史家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著作裡，史尼茨勒與佛洛伊德、華格納、克林姆、荀白克等人，共同成為「世紀末」（fin de siècle）奧匈帝國道德傳統、科學、審美文化的觀察指標，以及政治上自由主義傾頹過程嚴肅的見證者。但無論如何，蓋伊與休斯克所指意的，均為史尼茲勒心目中所觀察到的時代特質。參見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著、黃煜文譯，《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59-64。

¹⁸ 許雪姬曾指出，在近代日本女性史與生活史研究的書寫與內容編排上，也曾有過類似的趨勢與問題，參見許雪姬，〈評介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明治篇）》〉，《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1996年8月），頁359。

¹⁹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58、304、325；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24-225。

圖所屬的「戰爭期世代」，²⁰ 透過日記與私人記述的材料，在世界觀、興趣，以及對相同歷史事件與情境所顯露的反應和感想異同進行比較，²¹ 都能讓日記史料的運用與研究更往前邁進。

（五）本書也難免會有錯字與用詞上的手民之誤。錯字不贅，在校名方面，作者在本書中使用一般慣用的簡稱「新竹中學」（頁 39）和「臺中一中」（頁 43）來代稱「新竹州州立新竹中學校」和「臺中州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考量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及避免讀者誤解，應簡稱「新竹中學校」和「臺中第一中學校」較為合適；在人名方面，接任三澤糾擔任臺北高等學校校長者應為「下村虎六郎」而非「下村虎次郎」（頁 43）。又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中修三」（頁 95）應改正為「中脩三」；在國名方面，將新加坡誤植為「新加波」（頁 180）。

本書雖有上述筆者提出的疑點，仍具高度可讀性。特別是本書運用代表黃繼圖個人生命經歷的日記史料，雖然面臨歷史經驗的適用性和代表性問題，卻也提供了許多文獻檔案無法言及的歷史面向，有助於建構更多元的臺灣史景觀，並開拓出更豐富、嶄新的歷史風貌，是臺灣史領域在日記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²⁰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人「世代」(generation) 概念的闡釋與運用，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13。

²¹ 例如許雪姬曾比較八種公開或未公開的日記，說明終戰前後海內、外臺灣人在心境上的轉折。參見許雪姬，〈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臺灣文學學報》13（2008年12月），頁 151-178。

引用書目

王世慶

- 1991 〈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於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頁71-114。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卡爾·休斯克 (Carl E. Schorske) (著)、黃煜文 (譯)

- 2002 《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吳沁昱

- 2012 〈新竹市自治選舉與議會運作：以黃旺成政治參與經驗為中心 (1935-1951)〉。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叡人

-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收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

- 2006 〈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 (1917-1937)〉，《新史學》17(2): 127-218。

周婉窈

- 1989 《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2002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1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臺灣史料研究》37: 2-31。

彼得·蓋伊 (Peter Gay) (著)、梁永安 (譯)

- 2004 《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一個階級的傳記 1815-1914》。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林柏維

- 1993 《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

林獻堂 (著)，許雪姬、周婉窈 (主編)

- 2003 《灌園先生日記 (五) 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侯瑞·夏提葉 (Roger Chartier) (著)、楊尹瑄 (譯)

- 2008 〈新文化史存在嗎？〉，收於陳建守主編，《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頁413-436。臺北：時英出版社。

洪世昌

- 1997 〈《臺灣民報》與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化運動 (1920-193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若林正丈

- 2001 《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

張隆志

2009 〈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2): 161-184。

張炎憲

1996 〈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收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下冊，頁 131-159。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黃旺成的轉折：從社會參與到纂寫歷史〉，《竹塹文獻雜誌》10: 6-28。

張漢裕（主編）

2000 《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莊勝全

2011 〈腹有詩書氣自華？——黃旺成公學校教師時期的閱讀生活〉，收於川島真、松永正義、陳翠蓮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四集》，頁 269-302。臺北：稻鄉出版社。

許世楷

1972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許雪姬

1996 〈評介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明治篇）》〉，《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351-361。

1999 〈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167-211。

2008 〈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日記如是說「終戰」〉，《臺灣文學學報》13: 151-178。

許雪姬（總編輯）

2008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陳萬益

1999 〈臺灣報業史上的一等評論：論黃旺成的「冷語」「熱言」〉，《竹塹文獻雜誌》10: 29-40。

陳翠蓮

2008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 1920-1950》。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士榮

2008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國族意識的形成：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臺灣文學學報》13: 1-63。

黃秀政

1987 《《臺灣民報》與近代臺灣民族運動（1920-1932）》。彰化：現代潮出版社。

黃美蓉

2008 〈黃旺成與其政治參與〉。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黃麗雲

2011 〈日治大正期臺灣俗信與日本祝祭在臺施行情況：黃旺成的日記情境摸索與解析〉，《臺灣史料研究》38: 83-134。

楊 翠

1993 《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榮鐘

2000 《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廖振富

- 2011 〈〈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4): 201-239。

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

- 2005 《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合著）

- 1971 《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

Stone, Lawrence

- 1985 “The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 A Life of Learning.” *ACLS Newsletter* 36(1/2): 3-22.

Tzeng, Shih-jung 曾士榮

- 2009 *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